

中国古代墓葬概说

王仲殊

编者按：今年二月以王仲殊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古代史学者代表团，应全日空、朝日新闻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参加了由它们在东京联合举办的日本第五次古代史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是“探索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点”，主要是讨论中国坟丘墓和日本古坟的起源、发展及其他有关的问题，由中日双方的考古学者和古代史学者主讲。本文是王仲殊同志在这次讨论会上的讲稿。中方其他主讲人王世民、徐苹芳和黄展岳同志的讲稿，也陆续在本刊发表。

一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的发掘，说明中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了墓葬^①。

到了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明确的制度。墓坑一般都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数以百计的墓坑集合在一起，排列有序。多数的墓是单身葬，也有不少的墓是合葬。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合葬墓，往往是将许多已经埋葬的尸骨迁移而葬入同一墓坑内，他们是同一家族的成员，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紧密的血缘关系^②。有些合葬墓，埋着两个至数个完整的尸体，他们的性别相同，应系兄弟姐妹，而不是夫妻^③。与此相反，大汶口文化后期及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合葬墓所葬多为两个成年男女的完整尸体，说明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关系^④，而齐家文化的合葬墓则证明男子死后有以妻妾殉葬的情形^⑤。

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尸体在墓内的放置方式以仰身直肢的为多，偶然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后者可能是由于凶死。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了仰身直肢葬以外，还流行屈肢葬。仰韶文化的墓，尸体的头多

向西；大汶口文化的墓，尸体的头多向东。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族有着不同的葬俗。

各地新石器时代的墓，墓坑一般都是小而浅，除了容纳尸体以外，余地不大。在发掘工作中，除了个别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墓以外，一般都没有发现木棺的遗迹。但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少数的墓，墓坑面积甚大，坑内沿四壁用木材垒筑，上面又用木材铺盖，构成了木槨^⑥，这大概是由于墓主人在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幼儿死后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利用陶器作葬具，即所谓“瓮棺葬”^⑦。

墓中随葬品以陶器皿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或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然有之，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在有些墓地里，男子墓内多石斧、石铲、石刀之类，女子墓内多陶制或石制的纺轮，显示了男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⑧。由于地区和部族的不同，各地墓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颇有差异。但是，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可见在原始社会中各个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到了它的后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这在墓葬方面也有所反映。例如，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少数较大的墓，随葬的陶器有多至一百余件，猪头多达十余个的，说明墓主人拥有远比一般人为多的财富^⑨。

二

到目前为止,考古学上能够证实的最早的朝代是商。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而统治阶级的陵墓则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其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即所谓“亚字形墓”。安阳侯家庄的一座最大的“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三百三十平方米,加上四个墓道,总面积达一千八百平方米,深度在十五米以上^⑩。类似的“亚字形墓”,在山东省益都也有发现,则是属于诸侯或方国的首领的^⑪。

有的商王的陵墓,其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面和北面各有一个墓道,即所谓“中字形墓”。安阳武官村的一个最大的“中字形墓”,墓室面积近一百七十平方米,加上两个墓道,总面积达三百四十平方米,深度为七米余^⑫。除了王室以外,其他贵族的墓也有系“中字形墓”的,但规模略逊。

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所谓“甲字形墓”,其墓室成长方形,只在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字形墓”为小。据勘探,安阳武官村有一座较大的“甲字形墓”,有名的“司母戊鼎”是该墓的随葬品,可见它也是王室的陵墓^⑬。

除了上述三种类型的大墓以外,商代绝大多数墓,其墓室都是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式土坑,没有墓道。墓坑的形状虽然类同,但它们的规模则有很大的差别。大贵族的墓,面积可达二十余平方米,在安阳小屯发现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即如此。与此相反,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足十平方米。至于平民的墓,面积只有三、四平方米,有的甚至不足二平方米,与新石器时代的墓差

不多。

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内,都用木材筑成槨室。“亚字形墓”的槨室,平面呈亚字形或方形。其余各种类型的墓,槨室平面呈长方形。槨室的大小,随墓的规模而定。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槨室的正中。平民的墓,有的有棺有槨,有的有棺无槨。尸体在棺内的放置方式,主要是仰身直肢。无论是贵族或是平民的墓,墓中的主人只有一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商代有夫妻合葬的情形。

商王和各级贵族墓中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致。它们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等,种类和品目繁多,而以青铜器为最突出。上述的“妇好”墓,随葬各种青铜器四百四十余件,玉石器近六百件,骨角器五百六十余件,另有海贝近七千件^⑭。规模远比“妇好”墓为大的王陵,如果不被盗掘,原有的随葬品又该有多少?

商代统治阶级的墓葬制度,其特点之一,是杀戮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他们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卫兵、各种勤杂人员及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人的身份和待遇各有不同,但都是墓主人的奴隶。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

在安阳侯家庄的一座“亚字形墓”的墓室之上,发现了大型的砾石,应是房屋的基础。在安阳小屯的“妇好”墓和大司空村的两座长方形墓的墓坑上,都发现了用夯土筑成的房基及础石^⑮。由此可见,从王陵到一般的贵族墓,有时在地面上建有房屋。它们可能是供祭祀用的,即后世的所谓“享堂”^⑯。

三

西周的墓制承袭商代。由于西周的王陵

尚未发现,不知当时是否有“亚字形墓”。诸侯、贵族的大墓,有的是设有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有的是设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河南省浚县辛村的卫国诸侯墓,多系“中字形墓”,其形制与商代的陵墓很相似^⑩。除了上述两种类型的大墓以外,绝大多数墓仅有长方形的墓室,不设墓道,它们的规模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与商代一样,许多大小不同的墓,多在墓底设腰坑。

据记载,周代的棺槨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型和中型的墓,在槨室内置双重棺,可见上述的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

诸侯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但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在各种食器之中,鼎和簋是最重要的。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簋与鼎配合使用,八簋配九鼎,六簋配七鼎,四簋配五鼎,二簋配三鼎,亦有明确的规定^⑪。这种礼制,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得到了证明。例如,在河南省陕县上村岭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的虢国墓地中,有一些大型和中型的贵族墓分别随葬着七鼎、五鼎、三鼎或一鼎。墓的规模以“七鼎墓”为最大,“五鼎墓”次之,“三鼎墓”和“一鼎墓”又次之,而前者已被证实是虢太子的墓^⑫。

与商代一样,诸侯贵族的陵墓,往往在附近另设坑穴,埋置车马,称为“车马坑”,其规模亦视墓主人的身份而定。以上述虢国墓地为例,虢太子墓的车马坑埋车十辆、马二十匹,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埋车五辆、马十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规模最大的埋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

杀人殉葬的制度,在西周前期仍然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后则稍为减退。但是,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在有些诸侯贵族的大墓中还是

可以看到有人殉的情形。

发掘工作证明,西周已经有了合葬的制度,其方式主要是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异穴合葬”。在这一问题上,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的虢伯墓及其夫人邢姬墓的发现提供了最明确的证据^⑬。浚县辛村西周末年的卫侯墓和卫夫人墓,亦是可靠的例证^⑭。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例如,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的晋、韩墓地中,凡属大型或中型的贵族墓,都是两两成对,并列在一起。两墓的形制相同,而随葬品却有差异,一个墓内多兵器而少装饰品,另一个墓内多装饰品而无兵器,而前者所葬为男性,后者所葬为女性,说明他们是夫妻无疑^⑮。

四

根据考古发现,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随着铁器的制作和使用的逐渐推广,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历史学家们认为,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许多统治阶级的墓,在地面上筑有坟丘。在河北省的易县^⑯、邯郸^⑰,山东省的临淄^⑱、莒南^⑲,安徽省的淮南^⑳,河南省的固始^㉑,湖北省的江陵^㉒,湖南省的湘乡等地^㉓,都发现了筑有坟丘的大墓。据勘察,坟丘一般系用夯土筑成,有的呈方锥状,有的形状欠明,现存高度不等,最高可达十余米。这样高大的坟丘,是不见于前代的。河北省平山的中山王墓和河南省辉县的魏王墓,在墓室的地面上建享堂,则应该看作是继承商代以来的旧制^㉔。

在战国时代,地下的墓室仍然保持商代、西周以来的形制,有的大墓甚至还保留着腰坑。国君的陵墓,如上述平山的中山王墓和

辉县的魏王墓，都在墓室的南面和北面设墓道，与商代、西周的“中字形墓”相似^③。有些国君的墓，如安徽省淮南、寿县的蔡侯墓，则与许多贵族的墓相同，仅有一个墓道或没有墓道^④。湖北省随县的曾侯墓，开凿在丘陵的岩石中，规模甚大，但没有墓道，而且墓室的形状也不规整，是罕见的特例^⑤。诸侯贵族的大墓，仍流行在附近设车马坑。中山王墓的附近，除车马坑以外，还有“船坑”，坑内埋船。

与前代不同的是，战国时代的大墓，往往在墓室内积石以加固，积炭以御湿。辉县的魏王墓，则在墓圻内大量屯沙以防盗。在南方的楚地，流行用一种白色或灰色的特殊的粘土填在棺槨的周围，以保尸体和随葬器物不朽。

墓中的棺槨，仍然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诸侯贵族的大墓，用多重棺槨。湖南省湘乡牛形山的楚墓，棺槨有多达五重的^⑥。随县的曾侯墓，槨室庞大，分隔为四个部分。曾侯的双重木棺，都髹漆施彩绘，十分精致；尤其是外棺，形体高大，系用十条铜柱构成框架，在其间嵌入木板而成，可称别出心裁。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贵族墓内的随葬器物，无论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空前的程度。在当时，漆器的制作已有很高的水平，它们在墓内随葬品中所占的比重显著增加。但是，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看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例如：曾侯墓中有编钟一架，共六十四件（加上楚王所赠的一件铸钟，共六十五件），编磬一架，共三十二件，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大排场；在各种青铜礼器中，存在着“升鼎”一组，共九件，簋一组，共八件，也正符合他的国君身份^⑦。所谓“礼崩乐坏”，主要是指各级诸侯贵族的“僭越”，不是指礼制本身已不存在，考古发掘工作正说明了这一事实。

许多贵族阶级的下层分子和庶民阶级的上层分子，也纷纷在墓中用“礼器”随葬，但它们不是青铜器，而是模仿青铜器而制作的陶

器。在各地发掘的数以千计的战国时代的小型墓里，随葬品甚少，却都有着一组仿铜的陶器，如鼎、豆、壶之类。只有渭河流域的秦墓是例外，墓中的陶器是鬲、盆、罐、瓮等日用品，而不是“礼器”^⑧。这可能是由于秦受礼制的影响少，有它自己的葬俗。

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战国中晚期的小型墓中，出现了有用横穴式的土洞作为墓室的^⑨，也有用一种体积庞大的空心砖筑槨室，以代替木槨的^⑩。必须指出，这种横穴式墓和空心砖墓在当时还很不普遍。但是，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商周以来的传统的墓制已经发生了变化。

杀人殉葬的情形。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一些大墓里仍然大量存在。在上述曾侯墓里，共有二十一人殉葬，她们都系女性青少年，当为墓主人的侍妾之属。山东省临淄的齐国贵族墓和莒南的莒国贵族墓，也都有类似的殉葬人^⑪，后者除了侍女等人之外，还有专供杀殉的“人牲”^⑫。山西省侯马的一些战国中期的墓，规模不大，但也在墓的周围埋着许多被杀的奴隶，他们往往戴有刑具^⑬。但是，总的说来，在战国时代，人殉的情形确比商代、西周少见了。在当时，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河南省信阳和湖南省长沙等地的楚墓，由于有较好的防腐设施，墓中大量的木俑能完好地保存下来^⑭。以俑随葬，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

如前所述，从发掘工作的情况来看，到了战国时代，夫妻合葬比以前更为流行了。应该指出的是，除了大多数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方式以外，偶然也有夫妻同墓的^⑮。

从商代、西周以来，墓主人的尸体多是仰身直肢。但是，到了战国时代，除了南方的楚国以外，黄河流域的秦、韩、魏、赵、燕等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流行屈肢葬。特别是西方的秦国，在许多墓地里，采取屈肢葬的墓占相当大的比例，墓中尸体侧身而卧，四肢蜷曲。这可能是受黄河上游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种特

殊葬俗的影响。

五

汉代的墓与汉以前的墓在形制和构造上的区别,主要在于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圜,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其特点在于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在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然沿用战国以来的竖穴式土坑墓,墓中筑木槨。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槨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的前期。

在西汉前期和中期的竖穴式墓中,棺槨的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例如: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的主人是“五大夫”,身份相当于县令,所以用二棺一槨^④。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所葬为轂侯的夫人,其棺槨按诸侯的规格,是四棺一槨^⑤。北京大葆台一号墓所葬为燕王,用五棺二槨,这比列侯又高了一等,而与“天子棺槨七重”之制相同^⑥。在这个诸侯王的墓中,还使用了所谓“黄肠题凑”。

在贵族的大墓中,河北省满城的中山靖王墓和山东省曲阜的鲁王墓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⑦。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全墓可分耳室、前室、后室等部分。以中山靖王刘胜墓为例,墓中南耳室为车马房,放置车辆和马匹,北耳室为仓库,贮存大量的陶器,前室是厅堂,陈列帷帐和各种随葬品,后室是内室,放置棺材,墓的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故称“地下宫殿”^⑧。

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大量流行“空心砖墓”。西汉前期,空心砖墓的墓室呈长方形,形状像木槨。到了西汉后期,它的顶部往往搭成屋顶状,前壁搭成门的样子,更显得像房屋^⑨。砖面上的花纹,成了墓室内的装饰。有的墓里,还施彩色的壁画,其

内容有天象图、四神图、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图等^⑩。这些题材,在此后东汉墓内的壁画和石刻画像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大约在西汉的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它在中原地区取代了空心砖墓,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取代了当时尚在延续的竖穴式木槨墓,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大,结构复杂,其布局有如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绘有彩色的壁画。有的绘墓主人的属吏和侍从,将墓室布置得像他的官署^⑪;有的绘车马出行图和宴饮百戏图,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豪奢生活^⑫。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内容最丰富,主要是以车马出行图的形式描绘墓主人的全部仕途经历,以及与他经历有关的各处城郭、官府、仓库、市场、庄园,等等^⑬。

西汉晚年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它们的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的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的北部为最多,陕西省的北部和山西省的西部一带也颇不少。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画像的题材很广泛,但主要也是表现地主官僚阶级的生活和事迹。例如,山东省沂南汉墓的石刻画像中有一幅战争图,刻绘着墓主人乘车督战的情形,以表示这是他生前最值得纪念和宣扬的重要事迹^⑭。

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墓室的砖壁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作为装饰。画像的题材,既有讲经、宴饮、乐舞、车骑等地主官僚阶级的生活场面,也有收获、射猎、采桑、舂米、酿酒、煮盐等各种社会生产活动的情景^⑮。在四川各地,东汉及其以后还流行崖墓^⑯。

中国古代,棺槨并称,两者都属葬具。但是,商周以来的木槨实际上是墓内的构造,所以称槨室。上述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式

墓,包括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槨的作用,可称“砖槨”和“石槨”,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槨,而且,除个别例外,棺也不再是双重或多重的了。因此,周代关于棺槨的旧礼制在这里已不存在。

西汉的棺材,其制作是用榫卯拼接,有时用“细腰”合盖。东汉的棺材则普遍使用铁钉。贵族官僚们的棺材,极为精致。只要看过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三具彩绘的漆棺,就可以知道“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之语不虚。

如前所述,汉以前的合葬主要是夫妻分别葬于两个并排紧靠的墓圻中。直到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这种方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流行夫妻同墓合葬。从此以迄东汉及以后各代,遂成定制。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按照周代以来的丧礼,地主官僚阶级出殡时张举着一种旌幡,入葬时复盖在棺材上。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和临沂金雀山汉墓中,都发现了这种旌幡。它们系用绢帛制成,绘有彩色图画,故称“帛画”。图画的内容分三段,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并绘有墓主人的肖像^⑤。类似的旌幡,在甘肃省武威汉墓中也有发现,往往没有图画,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姓名,代替了上述帛画中的肖像,这便是所谓“铭旌”^⑥。

尸体在棺内的放置,都采取仰身直肢的方式。战国时代流行的屈肢葬,已经绝迹。大概是为了使尸骨不朽,出于对玉的迷信,有时用各种小玉具遮盖或充塞死者的七窍。塞在口中的称“琯”,常被制成蝉的形状^⑦。

皇帝和贵族,死时穿玉衣入葬,其目的也在于企图使尸体不朽。从出土的实物,并结合文献的记载来看,西汉的玉衣为金缕,东汉的玉衣则有金缕、银缕、铜缕之分。皇帝用金缕,诸侯王用银缕,其他多用铜缕。玉衣的使用限于汉代,曹魏时即被禁止^⑧。

和战国时代一样,在西汉前期的墓中常

有用竹简编成的簿册,记录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可称为“遣策”^⑨。有些墓中则用长方形的木版代替竹简,或可称为“赙方”^⑩。后者流行的年代甚长,直到魏晋时代的墓中仍有所见^⑪。

汉代地主官僚阶级讲求厚葬,墓内随葬品数量大,种类多。但是,和战国时代相比,墓中青铜器数量减少,而且已经失去了“礼器”的性质。漆器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总的说来,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是将生前实用的各种器物纳入墓中。西汉中期以后,风气一变,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最初是仓和灶,在秦代和西汉初期即有所见,以后诸如井、磨、猪圈、楼阁、碓房、田地等模型,以及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的偶象陆续出现,时代愈晚,特别是到了东汉,种类和数量愈多。这说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对随葬品的观念已经有了改变。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

在西汉中期的贵族墓中,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满城的中山靖王墓、曲阜的鲁王墓和北京的燕王墓便是例证。但是,车和马都埋置在墓室或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一般都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即使是帝王的陵墓亦不例外。在南方的江陵、长沙、广州等地的西汉和东汉的墓中,还有用木船或陶船模型随葬的^⑫。

在汉代,杀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工作中,除个别例外^⑬,已经看不到有人殉的情形了。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延续了千余年之久,至此遂告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在东汉的墓中,有时随葬着一种买地的契约,多刻在长条状的铅板上,称为“买地券”^⑭。它们是象征性的证券,放在墓内,使

死者有所凭恃,以确保对墓地的所有权而不被侵犯。在东汉至晚期,还流行用一种陶制的所谓“镇墓瓶”随葬,从瓶上的朱书文字看来,应与当时的道教有关^⑧。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它们的形状多呈方形覆斗状。祭祀用的祠堂,就东汉而言,如山东省肥城的“郭巨祠”和嘉祥县的武氏祠,都设在墓的前方。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⑨,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⑩。从东汉开始,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平生的主要事迹^⑪。

六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是,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地主官僚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有所改变。

考古发掘工作证明,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经很少见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贵族官僚们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有石门。和汉代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

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墓内的设施方面却有许多是汉代砖室墓中未见或少见的。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拱^⑫,南京的东晋墓中有直棂窗^⑬,它们都是用砖雕砌而成,模仿地面上的木构建筑。在南京等地的两晋的墓中,还往往设灯台或灯龕,以放置灯盏^⑭。从汉末、魏晋开始,直到南北朝,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以安置棺材^⑮。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设有台桌,放置各种随葬品^⑯。所有这些装置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大概是为了使墓室更像现实生活中的居室。

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都作斜坡式,长度较大。墓道由地面而下,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

井,直通地面^⑰。北朝后期,有些大墓的隧道长达二十米,天井有三、四个之多。这显然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每一个天井,象征一个院落;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

北魏后期,在贵族官僚的墓中,使用一种石槨,其形状完全模仿房屋^⑱。这种房屋形石槨,在此后的隋唐墓中更为流行。有的墓里,用房屋形木槨代替石槨,山西省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便是难得的一例^⑲。

魏晋之际,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的旧制,营建大墓,在墓壁和砖面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的壁画相似^⑳。但是,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以后,随着年代的推移,壁画又重新流行。远在云南省昭通的东晋霍弋墓,也绘有壁画^㉑。壁画的内容是墓主人的坐像和男女侍者、披甲执矛的门卒及人数众多的武装骑从的行列,并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图。在霍弋像的右上方,有墨书的铭记,记明他的官职、姓名、丧葬日期和地点等。类似的铭记,在朝鲜境内同时期的的大墓中也有所见^㉒,可见这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到了北魏,在中原地区的贵族墓中,更盛行绘壁画,而汉代以来长期流行的四神图和天象图则成了壁画的主要内容的一部分^㉓。

在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南朝,则流行用模印着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河南省邓县南朝墓中的画像砖,模印着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行列、孝子故事和四神图等,并施加彩色^㉔。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南京、丹阳等地的东晋、南朝的大墓中有用许多印着局部画像的砖拚砌而成的大幅“竹林七贤”图和“白虎”、“狮子”图等^㉕。这在前代是没有类例的。

在随葬品方面,和汉墓相比,也有明显的变化:铜器绝无仅有,漆器显著减少,供储藏用的大型陶器也少见。魏晋南北朝时代墓中的器物,主要是较小的陶瓷器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

活用具。它们的形制往往因地区而有差异,特征明显,有的仅见于南方而不见于北方。总的说来,瓷器的数量激增,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尤其如此。

汉代流行的仓、灶、井、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畜、家禽的陶制偶象继续被沿用,但往往形体不大,制作比较粗简。在长江流域的东吴和西晋的墓中,常用一种奇特的“谷仓罐”随葬,但不久就绝迹了。

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从两晋以迄南北朝,时代愈晚,俑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除了一部分是家内奴婢以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显著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⑧。仪仗俑队的规模,视墓主人的身份而定。大同北魏前期的司马金龙墓和洛阳北魏后期的元义墓中的仪仗俑,竟达数百件之多^⑨。此外,应该提到的是,到了北魏,在各种武士俑中,往往有成对的两件,形体特别高大,放置在墓门两侧,则显然是守门的卫士。在南方地区,除了陶俑以外,还有瓷俑,但总的说来,用俑随葬的风气不如北方为盛。

从汉末至魏晋,统治阶级常乘牛车,以后成为习惯,长期因袭不改。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官僚们的墓中往往有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上述由各种陶俑组成的仪仗队的排列,便是以牛车模型为中心的。

用陶制的“镇墓兽”随葬,大约是从西晋开始的。随着年代的推移,镇墓兽的形态不断演变。例如:西晋墓中的镇墓兽往往只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状^⑩。北魏墓中的镇墓兽都成双,置于墓门的两侧,作卧伏状^⑪。到了北魏后期,墓中的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⑫。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墓,镇墓兽多保持西晋时的形态而缺乏变化^⑬。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其特点之一,是在墓内置墓志。两晋的墓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方形^⑭,而洛阳发现的年代较早的西晋墓志则作碑形^⑮,可见它们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后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

注 释

- ①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3期。
- ② 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2期。
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9期。
-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等:《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1期。
- ④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9期。
-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2期。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4期。
- ⑥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 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3期。
- ⑧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6期。
- ⑨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 ⑩ 历史语言研究所:《侯家庄》(1217号大墓),1968年。
- ⑪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
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

- 器》,《考古学报》1977年2期。
- ⑫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5期。
 - ⑬ 杨锡璋等:《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1期。
 -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2期。
 - ⑮ 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9期。
 - ⑯ 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1期。
 - ⑰ 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 ⑱ 俞伟超等:《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1期。
 - ⑲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 ⑳ 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4期。
 - ㉑ 同⑲。
 - ㉒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等:《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2期。
 - ㉓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1期。
 -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2期。
 - ㉔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12期。
 - ㉕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1期。
 - ㉖ 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3期。
 - ㉗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4期。
 - ㉘ 固始县侯固堆大墓发掘组:《固始侯固堆主墓发掘结束》,《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
 - ㉙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5期。
 - ㉚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乡牛形山一、二号大型战国木槨墓》,《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3期。
 - ㉛ 傅熹年:《战国中山王罍墓出土的兆域图及其陵园规制的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1期。
 - ㉜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3期。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 ㉝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 ㉞ 随县擂鼓台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7期。
 - ㉟ 同㉞。
 - ㊱ 同㉞。
 - ㊲ 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7年3期。
 - ㊳ 王仲殊:《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4年8期。
 - ㊴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
 - ㊵ 同㊴。
 - ㊶ 同㊴。
 - ㊷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战国奴隶殉葬墓的发掘》,《文物》1972年1期。
 - ㊸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
 - ㊹ 同㊸。
 - ㊺ 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9期。
 - ㊻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4年。
 - ㊼ 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 ㊽ 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5期。
 - 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78年。
 - ㊿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 ①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 郭沫若:《洛阳汉墓壁画试探》,《考古学报》1964年2期。
 - ② 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
 - ③ 安金槐等:《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10期。
 - ④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 ⑤ 曾昭燏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 ⑥ 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 ⑦ 刘志远:《成都天迴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1期。
 - ⑧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4年。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1期。
- 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1期。
- ⑤⑥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
- ⑤⑦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 ⑤⑧ 史为:《关于金缕玉衣的资料简介》,《考古》1972年2期。
- ⑤⑨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4年。
- ⑤⑩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9期。
- 南京博物院等:《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3期。
- ⑤⑪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6期。
- ⑤⑫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6期。
-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
-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墓清理纪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6期。
- ⑤⑬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9期。
- ⑤⑭ 洛阳博物馆:《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6期。
- ⑤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
- 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11期。
- ⑤⑯ 陈明达:《汉代的石阙》,《文物》1961年12期。
- ⑤⑰ 孔次青:《山东曲阜孔林发现汉代石兽》,《考古》1964年4期。
- 陶鸣宽等:《芦山县的东汉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0期。
- ⑤⑱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武清县发现东汉鲜于璜墓碑》,《文物》1974年8期。
- ⑤⑲ 翟继才:《洛阳涧西16工区82号墓清理记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3期。
- ⑤⑳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8、9期。
-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6期。
- ㉑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6期。
- ㉒ 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 ㉓ 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2期。
- ㉔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
- ㉕ 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商务印书馆,1941年。
- ㉖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
- ㉗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
-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两座壁画墓的清理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2期。
- 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12期。
- ㉘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2期。
- ㉙ 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的》,《考古》1959年1期。
- ㉚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义墓调查》,《文物》1974年12期。
- ㉛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
- ㉜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8、9期。
-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2期。
-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2期。
- ㉝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6期。
- ㉞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
-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义墓调查》,《文物》1974年12期。
- ㉟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 ㊱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任家口279号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2期。
- ㊲ 同㉟。
- ㊳ 李蔚然:《南京四板桥南朝墓清理》,《考古》1959年3期。
- ㊴ 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戚家山东晋谢鲲墓简报》,《文物》1965年6期。
-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6期。
-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 ㊵ 同㊳。